

不同性别视域下的异质书写 ——《我在霞村的时候》和《金宝娘》的互文性阅读**

□杨利娟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摘要] 《我在霞村的时候》和《金宝娘》是叙述女性因失贞而遭受男权道德鞭笞的基于结构母题之上的互文性文本。相同的故事在不同性别视域的观照下呈现出异质性书写:《金宝娘》是正典的国家叙事,而《霞村》则以隐性文本的女性书写颠覆了显性文本的国家叙事,凸显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结构母题; 互文性; 性别视域; 国家叙事; 女性书写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8)02-0099-05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振聋发聩的“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一些疏离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且被传统文学史刻意遗忘的文本开始浮出地表,被置放于多重历史语境中重新打捞其意义和价值。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因蕴含了“双声话语”的女性书写而一度成为再解读的热点,这与同时代同为解放区作家的马烽以同一题材创作的《金宝娘》(又名《一个下贱的女人》)的命运正好形成鲜明的映照。一个故事,两样书写,对这两个文本的互文性阅读彰显了不同性别视域下异质性书写的典型性。

《霞村》和《金宝娘》就是建立在女性因失贞而遭受男权道德鞭笞这个结构母题之上的两个互文性文本。丁玲发表于 1940 年底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基本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村女贞贞不幸被进村扫荡的鬼子掳去当了随军妓女,后来她与边区政府建立了联系,并利用身份之便为抗日军队递送情报。一年后贞贞从日军营中归来,却受到村民的鄙视与伤害,被唾骂为“破鞋”、“破铜烂铁”。而解放区另一位作家马烽 1948 年底以短篇小说《金宝娘》再次搬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村妇翠翠(即金宝娘)因不肯就范于觊觎其美色的地主之子的威逼利诱,被当作花姑娘送进了日军碉堡。此后迫于贫困,为了奉老抚幼,她索性“泼出身子”做了暗娼,“在苦海里漂流了七、八年”,成为村民眼中的“烂货”、“坏女人”。

“互文性”这一概念于 20 世纪 60 年代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被这样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而在法国符号学家米歇尔·里费特尔看来,一切互文性关系都必须置于每一个文本的结构母体之上,即文本和它的互文本是同一结构母体的变体。他在《自足的本文》中指出:“意义是建立在本文所提供的结构基础上,每一个原来的破译都是这个结构的变体。”由此可见,互文性关涉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吸收、戏仿以及批评活动。

同是描写“农村社会中被邪恶势力和世俗观念折磨着的苦命的灵魂”^[2],两个曾经纯洁无瑕的美丽女性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遭际也如出一辙,但相似的故事却在作者不同性别视域的过滤下被演绎成两个迥然相异的文本:《金宝娘》从纯粹的男性视角,以正典的男性书写——国家叙事的范本堂皇地迈进了“民族国家文学网络”^[3],而《霞村》则以“双声话语”的方式,以隐性文本的女性书写颠覆了显性文本的国家叙事,凸显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并因此招致了传统文学史打煞和“重写文学史”捧煞的戏剧性命运。

• [收稿日期] 2007-06-19

• [作者简介] 杨利娟(1971—)女,浙江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种书写机制本身体现了特定的观察视角、阐释和评价机制。男性书写是基于革命、解放、民族、国家“大意义”的宏大叙事,代表了宏观的、权威的观察视角;作为对宏大叙事的对抗,女性写书则站在第二性的立场上,倾吐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性别重荷与苦难,是基于女性自身身体和生命体验的“小意义”的性别叙事。在男性霸权文化的威慑下,女性作家深感身份焦虑,她们试图探寻自我的存在,但处处充斥的男性权威又使她们不得不在被压抑和反压抑中挣扎着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由于父权制文本的无处不在,女性书写总是“双文本”、“双声话语”的。这种“‘双声话语’既体现着主宰社会的声音,又体现着属于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在表面显性声音中隐含了异样的声音。……这些作品表面意义模糊,能为主流社会所认同,但却掩盖了更深层的,更不易理解的,更不易为社会所接受的意义层次:这些作家通过遵守和屈从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获得了真正女性文学的权威”^[4]。在“双文本”中,为了取得合法的表达手段和权力,显性文本往往是女性文本对男性霸权文化不得已的模仿和利用,而寄生在显性文本上虽多少有些“失声”,“像已拭去了原有字迹的羊皮纸”般的隐性文本,才是女性作家以独特的性别体验精心构筑的“一间自己的屋子”。

同一叙事资源被纳入不同的性别话语系统,构成了男性书写与女性书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场。这两种书写“登场的方式迥异,声音有别,价值互补”^[5]。本文将细读的方式对这两个文本展开互文性阅读,从叙事主体(作者、叙述者)与客体(人物形象)两个角度解读男性书写悉心建构的国家叙事如何被女性书写以深切的性别体验所消解和颠覆,并发出了自己被压抑的声音。

二

“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的”^[6],身份是一个人的重要标志。每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都不同程度地同时承担着自然、家庭、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身份角色,这些互相关联的身份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因此,从人物身份因素入手,建构相应的关系网络,是作家展开叙事的有效途径。同时,对作品中人物不同身份的侧重或强调也体现了作家不同的叙事理念和叙事姿态。在20世纪40年

代政治统帅文学的历史语境中,《金宝娘》以阶级分析法作为指导原则,因而作者强调了叙述者的政治身份;而《霞村》则在政治身份的掩护下侧重了性别身份,确立了女性书写的叙事视角。

两个作家出于行文之便都采用了第一人称:“我”,其既可作为外来者观察村民对她们(翠翠和贞贞)的反应,又能直接走近主人公感知其精神律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是马烽“炕头谈心”式作品的惯用手法,而这在丁玲于延安时期的创作中却极为少见,其中已然渗透了性别书写的信息,“‘我’与贞贞竟有一休戚与共的关系。……贞贞的出现俨然具象化了她(指作者丁玲)‘身为女性’所特有的期盼与恐惧。”^[7]行文伊始,作家便以对叙述者的身份认同展现了两个文本不同的叙事视角:“一九四七年冬天,我被分派到店头村领导土地改革”。这是《金宝娘》的开头。作为“山药蛋派”的后期掌门人,马烽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革命作家,他说:“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广大农民奋发图强参加建设,中国也不可能开创新的局面。作为一个革命作家,我认为有义务热情歌颂他们不朽的功绩,也有责任帮助清除多年来封建思想、旧习惯势力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8]。因此,以革命工作者身份登场的“我”将会顺理成章地展开关于阶级斗争、革命建设的宏大叙事。而《霞村》中“我”到霞村是为了“休养”,“政治部太嘈杂”是“我”到霞村去的原因,为什么“政治部太嘈杂”?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却透露了“我”的身份——政治部里一位革命工作者。与《金宝娘》不同的是,革命工作者的“我”到霞村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工作,这是女性书写对国家叙事的巧妙疏离,正是这种疏离为作者进行性别叙事制造了空间。

“我”的身份认同为设置“我”周围关系网络中的人物身份提供了参照:《金宝娘》中“我”“住在中农刘拴拴院里”,“中农”是一种阶级身份,属于土改中要团结的对象,这种有意无意渗透在文本中的阶级表述是典型的国家叙事话语,而《霞村》中“我”则住在刘二妈家里——贞贞是刘二妈的侄女,属于人伦血缘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国家叙事所极力压抑和排斥的。饶有意味的是,《霞村》为“我”安排了一位同行的女性阿桂。这个看似不经意安排的人物事实上是作者的另一种在场:在“我”有感但不便于直接议论和表达时,她总会适时出场,代“我”发言。对贞贞的遭遇“我”虽然没有激愤的言辞,但作者却以春秋笔法含蓄

地传递了“我”对她的深切同情和关注。而阿桂的反应则不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不住的唉声叹气”,就是“一幅难受的样子,像要哭似的”,并警人耳目地发出了“我们女人真作孽呀”和“做了女人真倒霉”的感叹。因此,当“我”和贞贞日渐亲密之后,她也适时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阿桂走了”。“我”、阿桂、贞贞三位一体,众声喧哗,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夏娃的言说。在充满豪情和霸气的国家叙事笼罩下,女性书写就这样以各种策略和技巧不屈不挠地拓展自我表述的空间。

在作家不同性别视域的聚焦下,命运遭际相同的人物给叙述者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受,强化了基于同一结构母题的两个文本的异质性书写。《金宝娘》中“我”看到翠翠之前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但初次见面,“我”眼中的翠翠剪发头,宽裤腿,还穿着一对破旧了的红鞋。她这一身和年龄十分不相称的打扮,引起我一种厌恶的感觉,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正派女人。”翠翠的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中不容于传统道德的异类。仅仅因为穿着打扮不符合传统习见就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女性施以简单粗暴的道德仲裁,这是男权社会把女性妇容妇德规约移植到土改时期的结果。而当“我”得知翠翠是由于地主迫害才被迫沦落的不幸遭遇后,“感到极大惭愧:一个革命工作干部,单从片面的印象出发,骂了一个被旧社会逼害的女人”。如此,男权社会的贞操观对女性的戕害被轻描淡写地化约为阶级压迫,身为女性所承受的性别负荷被革命的洪流冲洗殆尽。与此相反,《霞村》中虽然见到贞贞之前“我”先被关于她的飞短流长充塞了头脑,但并没有据此对自己的性别盟友施以男权社会的道德棒杀,在村民视为不洁的贞贞脸上,“我”看到的却是她无与伦比的纯洁:“虽在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子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对于贞贞,“我”始终从人性角度对她进行了肯定:“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尽管丁玲以显性文本一再明示“革命”是贞贞性格明朗的原动力,但无论如何,革命的外衣包藏不了作者为女性自身解放摇旗呐喊的一腔热情。如此美化一个妓女而且是有着民族仇恨的日本随军妓女,对于正典国家叙事的冲击无疑是猛烈的。诚如王德威所言,丁玲虽表面上存有“欲藉小说渲染一福

音式政治讯息的动机”,但“这个表面看来头头是道的小说,其实深具女性主义讯息。它的挑衅性不在于美化了妓女或丑化了民族正气,而在于根本摇撼了传统文化论述所视为当然的那套女性神话”^[7]。

三

“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觉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着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和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不仅梁启超作如是观,毛泽东亦作如是观”^[9]。李陀的话语为我们解读不同性别视域观照下女性解放与国家解放的关系洞开了一扇门扉。

除却失贞而言,翠翠无疑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模塑出来的“天使”形象,她具备一切男权规约的女性美德:温柔、美丽、顺从、无私,她对丈夫“我活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我至死总不变心”的表白是经典的男权社会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当丈夫被迫远走他乡,婆婆病人膏肓无钱可医,儿子饥饿啼哭,而一直觊觎她美色的地主之子刘贵财又通过威胁村子里的佃户们堵死了翠翠通过借粮以解燃眉之急的唯一出路时,求告无门的翠翠不得已动用了女性走投无路时的唯一资源,走上了卖身的道路。浸淫在父权制文化包围下的翠翠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男权社会的规训,并将这种压抑转化为内在的自我需求,依照封建道统对失贞女性的预设逻辑作了一个低声下气的“可怜人”:对人说话唯唯诺诺,开口就是“我是个下贱女人”;当“我”主动到翠翠家时,她“吓得不知该怎好,忙扫开炕让我坐”,并悲惨地说自己“名声坏,活得还不如条狗!谁也看不起”。就连“我”想在她家喝口水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这水喝不得,我长着赖病,怕染上你”。

相比之下,贞贞则是“霞村”的叛逆者。她果断拒绝了一段“咱们(村里人)都说好”的姻缘,不愿做家道厚实的小老板的填房,偏偏爱上了贫穷的小伙计夏大宝。在劝说恋人带她远走高飞不成,父亲又坚决逼婚的情况下,贞贞以到天主教堂找外国神父“做姑姑”进行了决绝反抗。贞贞无疑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莎菲的后继人^[10],身上带着浓郁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气息。尽管“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活在流言蜚语的围追堵截下,失贞的贞贞依然活得“脸色红润,声音清晰”,哪里有被鬼子

糟蹋得“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的影子?不唯如此,在成为霞村人鄙视和唾弃的对象后,贞贞竟然拒绝了不嫌弃她的恋人夏大宝的求婚!按照男权社会的通行逻辑,女人失贞即为不洁,理当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如果有一个男人肯接纳她,那不啻于上天的恩赐,更何况是夏大宝这样一个还不错的男人。但贞贞居然拒绝了!于是霞村人举起了流言的刀剑。

翠翠的内心深处虔诚的卑微感是父权制社会的威压使然,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别压抑在国家叙事中被化约为阶级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不幸,妇女的翻身必须依附于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这是男性书写的天然逻辑。贞贞的坦然和“我”对贞贞的欣赏源于“革命”的支撑,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文本的显性叙事因之被成功地纳入国家叙事轨道。但透过显性叙事,文本的潜在叙事却以四两拨千斤之力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国家叙事:“革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男权社会对失贞女性的道德歧视如影随形地纠缠着革命的贞贞,她自认为“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并因此拒绝了恋人的求婚。而“我”在欣赏贞贞的同时,对她的深切同情是建立在女性性别和身体的切肤体验之上的。贞贞以一己之身体参与了解放大众的革命事业,但革命却救赎不了贞贞,这种献身不但不被大众认同,反而成为道统习见对其进行棒杀的口实,这颇有些鲁迅在《药》中对革命与大众关系反思的意味。但丁玲并未驻足于此,她走得更远:“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在这里作者触及了一个悖论:解放大众的革命需要女性献身,但女性的献身却得不到大众的理解,文本显性叙事与隐性叙事的分裂凸显了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的抵牾,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乘着“五四”大潮毅然冲出封建家庭樊笼的子君(鲁迅小说《伤逝》)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宣布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但个性解放的春风并未像预期的一样为这个勇敢的小女子吹开幸福的花朵。贞贞则以“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的低语,不但否定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习见,也质疑了子君所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体现了丁玲对女性自我价值的深层追问。在此意义上,《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表现女性之孤独与女性之困境的小说,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在这里,女性问题超越了国家、民族问题,被还原为纯粹的女性问题。换言之,性别的悲剧在小说中被用超国家、超民族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11]。

不同性别视域的烛照为两个女性安排了不同的命运归宿。马烽从政治视角出发,给出了乐观主义的答案。既然翠翠的悲剧源于阶级压迫,那么在造成这种压迫的根源消失时,翠翠理所当然苦尽甘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从地主家搜到的药治好了她的性病;在土改中分到了地;久无音讯的丈夫归来而阖家大团圆。而丁玲则以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为贞贞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贞贞带着“再重新做一个人”的希望到延安治病去了。“尽管‘革命’仍在别处,但却有希望存在”^[9]。

《金宝娘》中有这样一个看似不经意却不容忽视的情节:政权更迭后,翠翠依然未能尽快获救,仍被定为“二流子”,当作烂货戴着纸帽游街。革命政权内部女性仍被压迫和压抑的事实本是值得女性主义者大书特书的情节,却被国家叙事以过于乐观的态度和浅露的大团圆结局轻易地涂抹掉了——因为“对于左派乌托邦主义而言,这些问题只要随着‘革命’的成功,自可迎刃而解”^[7]。而《我在霞村的时候》则体现着丁玲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切忧虑,“尤其在连锁政治、道德与性别的畛域时,丁玲揭发了革命的阶级斗争或前进的意识形态,依然有男女之别,而女性的遭遇亦无法化约为‘人民’或‘国家’的境况”^[7]。

革命成功了,翠翠的不幸成为尘封的历史记忆,“革命”的灵丹妙药拯救了女性——男性书写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终结于国家解放。而贞贞带着新生的希望奔赴延安则表明了丁玲对女性命运的探寻却仍然在继续。革命的延安能够拯救贞贞吗?丁玲摒弃了廉价的乐观态度,以《“三八节”有感》互文性地延展了贞贞的命运:“并非天生‘落后’的延安妇女,婚前曾壮志凌云般地追求着革命,婚后被迫退居家庭,频繁的生育,匮乏的物质,过度的操劳,使她们过早红颜老衰,于是‘落后’的帽子便成为革命丈夫结纳新欢、离弃旧人的最好口实。在这个意义上,把延安作为人生起点的贞贞,她的这个起点何尝不是那些曾经‘进步’地投奔革命,最终‘落后’地淘汰出局(婚姻)的女性们的共同的起点”^[12]?

四

作为“山药蛋”派的主力作家之一,马烽站在现实的大地上,始终以“歌颂”作为自己的主旋律,《金宝娘》通过翠翠的人生在新旧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讴歌了新生的政权,讴歌了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丰功伟绩,成功地进行了国家叙事,而丁玲则自登上文

坛伊始,就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自杀日记》、《暑假中》等一系列作品展开了对女性命运之路的追索,《霞村》无疑是新政权成立后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实践过程中丁玲对女性解放的再思考。如果说之前丁玲无奈地发现现代都市并没有给女性提供更为合理的生存空间,反而是新的无路可走的孤独的话,延安时期她对女性解放的叩问更发人深思,也更凸显女性书写的特质:因为“‘女性解放’的议程虽然有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相重叠的部分,但不能被民族、阶级问题全部覆盖。相反,如果从女性角度提出性别秩序问题,将不是强化‘民族’、‘阶级’的整合,而是会暴露民族国家、阶级秩序内部的父权制,并分裂、颠覆民族/阶级的主体形象,从而动摇国族主义的合法性”^[12]。

参考文献

- [1]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65-566.

出版社,1998:565-566.

- [3] 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315.
- [4] 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7.
- [5] 喻见.女性书写与男性写作的两种意义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荷花淀》的比较阅读[J].文学评论,2005,(5):98.
- [6] 佛克马、奴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8.
- [7] 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M].上海:三联书店,1998.
- [8] 马烽.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217.
- [9]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250.
- [10] 茅盾.女作家丁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102.
- [11] 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2):216.
- [12] 常彬.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J].文学评论,2005,(5):93.

Distinct Writing under Viewing Area of Different Gender

——Intertextual Reading about The Time When I Was in Village Xia and Jin Bao's Mother

YANG Li - jua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e matrix that women suffered moral lash just because of their being deprived chastity, Jin Bao's Mother and The Time When I Was in Village Xia belong to intertextual texts. However, the same story took on distinct narrative under different gender viewing area. The former was classical nation narrative, while the latter appeared obvious feminine consciousness because its noticeable nation narrative was subverted by concealed women's writing.

Key Words structural matrix; intertextuality; gender viewing area; nation narrative; women's writing
(编辑 戴鲜宁)

不同性别视域下的异质书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和《金 宝娘》的互文性阅读

作者: [杨利娟](#), [YANG Li-juan](#)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8, 10 \(2\)](#)

参考文献(12条)

1.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 1993
2. [扬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 1998
3. [王晓明](#) [批评空间的开创](#) 1999
4. [邱运华](#)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2005
5. [喻见](#) [女性书写与男性写书的两种意义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荷花淀〉的比较阅读](#)[期刊论文]-[文学评论](#) 2005 (05)
6. [佛克马; 蚁布思; 俞国强](#)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1996
7. [王德威](#) [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 1998
8. [马烽](#) [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 2000
9. [贺桂梅](#) [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 2003
10. [茅盾](#) [女作家丁玲](#) 1979
11. [董炳月](#) [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期刊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02)
12. [常彬](#) [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期刊论文]-[文学评论](#) 2005 (05)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802023.aspx